

中 國 作 家

別解古典小說

古 耕 ○ 选 编

一語讀
金瓶梅

古 阿 魏 牧 赵 魏 冯 宁 王 鄭 聶 錦 鮑 魯
田 晓 菲 英 闻 宇 子 云 景 深 長 之 宗 一 振 鋒 弩 迅
耜 舟

黃 陳 王 孟 李 刘 施 孫 吳 茅
霖 冲 溢 嘉 超 存 莫 满 何 古 师 心 武 裳 存 犀 暝 盾

京華出版社

中國作家別

解古典小說

古 耙 ◎ 选編

精讀一

金瓶梅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悟读金瓶梅/古耜选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0724-527-8

I. 中... II. 古...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767 号

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悟读金瓶梅

选 编 古 耒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数 17 印张

印 数 1 - 6000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527-8

定 价 29.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现当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说

(代序)

古 韶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们以特有的丰瞻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曾立足于世界小说的大背景，作过高屋建瓴的阐述。他认为：“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会对那个传统（即中国小说传统——引者注）中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持赞许态度；而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也归入中国小说的古典名作之列……这六部作品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人最心爱的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虽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和裹挟，并因此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西化倾向，但是，他们对于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没有任何的忽略和轻视，而是始终给予了满腔的热情和充分的关注。诸多专家、几代学人围绕中国古典小说展开多视角、多层次、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拓展出广阔天地，收获了丰硕成果。正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所写：“在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谓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形成了一道道绚烂的景观。”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格局与大场景中，活跃着一批身份特殊但却实力雄厚的研究者，这就是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在进行各种创作之余，或以散

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应当看到，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呈现出别一种繁荣和生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筚路蓝缕而又博大精深，开现代意义上古典小说研究的先河，并为其奠定基础，自不待言；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张爱玲的《红楼梦魇》、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聂绀弩的《水浒五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吴组缃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游记漫话》、陈迩冬的《闲话三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等，亦在各自的视阈内领异标新，卓尔不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既定的主体条件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独特的形态与风貌，这是现当代作家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特殊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由来已久的学科樊篱和学术偏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和文学界对现当代作家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没有给予认真的整理和必要的总结，以致使这笔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散乱、沉寂与零落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有必要通过积极而扎实的努力，来尽量改变这种情况。

那么，相对于学术界一般的古典小说研究，现当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读古典小说时，究竟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与个性？这样的特征和个性对于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又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效果？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启示？以下笔者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着加以归纳和描述。

第一，现当代作家的古典小说研究和解读，喜欢从文本实际出发，着力于作品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表达，同时自然渗入论者得之于创作实践的眼光和经验，这决定了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常常能够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作品精髓和艺术规律，

并因此而富有文学创作上更直接、更具体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纵观五四以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林林总总的论著、观点和争鸣的背后，在由种种社会思潮引发的学术意趣变幻更迭的内里，真正实现着顽强赓续和不断延伸，并由此构成了清晰线索与轨迹的，是两种交织着传统文化和现实基因的取向，这就是：一、在价值层面上，儒家“宗经”“载道”的文艺观与新文学“为人生”直至“为政治”的现实诉求相拍合，推动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一向执著于作品主题思想、认识价值和当代意义的发掘、探寻与评估，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诠释的特征；二、在方法层面上，源远流长的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验主义哲学相嫁接，再加上由此衍生的东方式的“趣味主义”，决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总有一种“做学问”的执拗和韧性，总喜欢在作者、本事、版本、器物的考证上下工夫、用气力，有时即使是外力的抑制亦难以生效。应当承认，这两种取向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应有之义。都为我们充分认识、深入了解和正确评价作为文学遗产的中国古典小说，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只是当它们一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主流形态和基本范式，特别是当它们凭借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形成某种绝对的定势和强势时，那么，也就在无形中抑制和挤压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所必须同样具备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另一个维度——围绕作品展开文本的、艺术的、审美的、技术和表达层面的阐释与归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文革结束后复出的俞平伯，为什么要一再表示：“《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的意见。这意见虽然是针对某一部古典小说而言，但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

而在这种背景下，真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填补着缺欠和校正着偏颇的，恰恰是出自现当代作家之手的一些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著。这些论著尽管有着不同的写作背景、生成机缘和文体形态，但是，写作者特有的文学创作的眼光、素养和经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文学本体的敏感和热爱，却使得它们不约而同地保留了文本的和艺术的视线，进而针对特定作品，实施审美勘探，努力揭示其作为小说的价值所含和贡献所在。不妨以老舍为例。早在“红学”考证风行一时的1930年代，他就明言：“读一本伟大的创作，便胜于读一百本关于文学的书。读过几段《红楼梦》，便胜于读十几篇红楼考证文字。文学是生命的诠释，不是考古家的玩艺儿。”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多方面揭示了《红楼梦》的艺术优长。其中发表于1954年12月号《人民文学》的《红楼并不是梦》一文，更是在政治压倒学术的舆论条件下，着重强调了曹雪芹塑造人物和驾驭语言的非凡功力，显示了作家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准确把握。冰心的《〈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是一篇专门的艺术谈。它由《红楼梦》人物设

计和描写往往是“两山对峙”的特点说开去，将作家的独特匠心和作品的精巧照应，以及这一切所产生的审美意义，分析的入情入理，精彩异常。何其芳写于1956年的《论红楼梦》虽然涉及到作品的若干方面，但其中用墨最多，也最见精神的，还是有关人物塑造的论述。该文围绕贾宝玉和林黛玉形象所展开的艺术分析，以及由此抽象出的文学典型的“共名说”，不仅触动了当时的文学教条，而且直接引发了新时期有关“人物性格二重性”的思考与探索，从而成为当代文艺理论变革的先声。茅盾论《水浒》是引入了阶级观点的，只是这种引入并不妨碍论者紧扣作品的艺术形象，展开具体深入的解剖。他的一篇《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就是透过不同的“存在”所产生的不同的“意识”，把林冲、杨志和鲁达三个人物的个性，勾勒了出来，从而彰显了《水浒》人物塑造的突出成就。当然，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充分、也最为出色的，还是鲁迅先生。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便始终贯穿着一种艺术发展的眼光和尺度。譬如，他盛赞《红楼梦》，是因为“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即“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他激赏《儒林外史》，是鉴于该著不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讥讽所向，尤在士林”；而且“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即使讲《水浒》的版本演变，似也不忘从创作的角度考虑问题，所谓“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既可作如是观。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真正充盈着小说意识的小说史。此外，吴组缃谈《儒林外史》的春秋笔法，牧惠谈《金瓶梅》的细节蕴含，王蒙谈《红楼梦》的时间艺术，王安忆谈《红楼梦》的结构安排，马瑞芳谈《聊斋志异》的人物描写，等等，无不熠耀着高超而独特的艺术见解，体现了作家更多来自于创作实践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应当承认，面对诸如此类的阐释与评说，读者不仅能够领略既定作品的无限奥妙，而且久而久之，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切合小说实际的行家目光。

第二，现当代作家的古典小说研究和解读，并非单单凭借学理或实证，有时更习惯依靠感觉、直觉、联想和顿悟，即所谓“悟读”，这决定了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通常是言简意赅而又切中肯綮，智光闪烁而又直逼文眼。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早期样式，是以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为代表的小说序跋与评点。这类序跋和评点文字虽然一般都为文简约，篇幅不大，但就作者的思维和言说方式来看，却初步包含并呈现了论——分析、评论，辨——辨识、考证，悟——随想、感悟，这三种形态和三种元素。现代意义

上的古典小说研究在借鉴西方文论诸多要素和优长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不过这种继承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具体来说便是，“论”因为接近西方的逻各斯体系，“辨”由于体现了传统的朴学精神，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赓续和发扬，而惟独“悟”这种更具有东方色彩和民族特点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因为一时找不到学术支点，所以被正宗的古典小说研究抛到了一边。而事实上，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而言，“悟”的元素，极为重要。关于这点，既是学者、文艺评论家，又是散文和散文诗作家的刘再复，在谈到自己的《红楼梦》阅读与写作时，曾有精彩的论述：“《红楼梦》的确是曹雪芹阅历感悟人生的结果。这部伟大著作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红楼梦》禅味弥漫，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它的确是部大彻大悟之书。既然是部悟书，那么，光靠头脑去分析就不够了，恐怕还得用心灵去领悟，即以心会心，以悟读悟。禅宗方法论此处倒是用得上。”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刘再复把自己的读“红”笔记，称之为“论”与“辨”之外的“尝试《红楼梦》阅读的第三种形态”，并干脆用《红楼梦悟》来命名。而质之以该著的文本，远离论证和考证的“悟读”，确实构成了其突出的特点。譬如，它这样写《红楼梦》特有的价值：“故国几部经典长篇小说，虽然都有文学成就，可惜《三国演义》太多‘机心’，《水浒传》太多‘凶心’，《封神演义》太多‘妄心’。唯有《西游记》和《红楼梦》总是让人喜欢，愈读愈感到亲切。《西游记》具有童心，《红楼梦》则具有‘爱心’。贾宝玉也有孙悟空似的童心，但它经过少女的洗礼与引导，又升华为大爱与大慈悲之心。因此，《红楼梦》的精神境界比《西游记》又高出一筹。”它这样写贾宝玉的精神个性：《红楼梦》中“除了一个傻大姐之外还有一个傻哥哥，这就是贾宝玉。傻大姐是天生的白痴，什么也不懂。傻哥哥却有大爱与大智慧。呆中的迷惘，痴中的执著，傻中的慈悲，憨中的悟性，沉默中的逃离家园和告别黑暗，哪样不是真性情与真灵魂。”诸如此类的文字，言简意赅而又举重若轻，不涉理路而又一矢中的，真可谓别具慧眼与慧心。

其实，如果我们不仅仅拘泥于概念和命名，而是更多从阅读实际出发，那么则应当承认，凭借感觉、直觉、联想、灵感等等，来悟读中国古典小说，并非是刘再复的创造，而是许多现当代作家由来已久的选择。说具体些，是他们将自己所擅长的形象思维用之于古典小说研读，所生成的一种奇特路径和天然优势。不妨来看端木蕻良笔下的一段文字：“在古典小说中，不知为什么，我最看不进去的，是热热闹闹的《封神榜》。我曾强制自己看完它，一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做到。至于冷冷清清的《儒林外史》，在我心目中却占有很高位置，但又不喜欢那种白描法。说真的，我一直不认为《红楼梦》纯粹是写实手法，我对它的艺术

有自己的看法，无以名之，试名之曰意象手法。至于合适不合适，我不去管它。总之，我认为是这样。”这样的表述堪称典型的以悟见长，由悟取胜，它通过直陈感悟，传达了作家对古典小说作品很别致但又很准确的见解与判断。张爱玲一生喜欢《红楼梦》和《金瓶梅》。而她谈“红”说“金”的文字，虽然走的是考证的路子，但内中却常常闪烁着体悟的智慧和灵感的妙用。她针对《红楼梦》的人物年龄因版本不同而不同的现象，断言：“早本白日梦的成分较多，所以能容许一二十岁的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万红丛中一点绿。越写下去越觉得不妥，惟有将宝黛的年龄一次次减低……因此宝黛初见面时一个才六七岁，一个五六岁，而在赋体描写中都是十几岁的人的状貌——早本遗迹。”她认同美国汉学家韩南关于《金瓶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他人补作的说法，而认同的依据则仅仅是当年她读《金瓶梅》时的感受：“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这样的论述主要以感觉和体验为基石，但这感觉和体验中，却包含了逻辑推理之外的别一种发现性和洞察力，因此它们同样给人以启发。林庚是学者，但更是诗人。他晚年以诗人的心灵和思维来漫谈《西游记》，一时间奇思迸发，妙悟迭见，如从孙悟空身上发掘出了江湖意味，由猪八戒的观念联想到了农民意识，在小妖精那里看到了未泯的童心，等等。难怪陈平原认为，该书“是诗人‘用心’写作的大书，必须排除杂念（包括所谓的‘学术通则’），同样‘用心’去体会，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显而易见，如此这般的古典小说解读，对于迄今为止的研究界和学术界而言，既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又是一种有效的实验，它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现当代作家的古典小说研究和解读，常常在必要的理论参照之外，融入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感受和生命体验，这决定了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可以言他人所鲜言，发他人所未发，具有别一种内涵和深度。

作家是生活的耕耘者、发现者和言说者。一种表现生活和判断生活的精神需求与职业习惯，使得他们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比书斋里的学者拥有更强的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同作家特有的生活经历、生存感受和生命体验交织整合，就足以形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与主体优势。它们出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可以化为丰腴厚重的艺术形象；而一旦反照到作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读上，则必然呈现出别样的理解、对话与沟通，这就是，在必要的理论参照之外，常常靠经历和阅历来思考、来说话。

请看孙犁读《红楼梦》之后的内心剖白：“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

否则，只能说是知道人生的一半。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这就是红书上所谓‘过来人’。”“历史上‘过来人’是那样多，可以说是恒河沙数，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作品，却寥若晨星，很不相称呢？这是因为‘过来人’经过一番浩劫之后，容易产生消极思想，心有余悸，不敢正视现实。或逃于庄，或遁于禅，自南北朝以后，尤其如此。而曹雪芹虽亦有些这方面的影子，总起来说，振奋多了，所以极为可贵。”毫无疑问，这些写于1979年的文字，是渗透了作家的文革经历与磨难的。那深沉的字里行间，分明蕴含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灵犀相通与情感相融，它是作家的烛幽发微，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其结果则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价值所在。张爱玲自云：“十年一梦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只是究其实质，她在《红楼梦》上所下的功夫与其说是考据，不如说是对曹雪芹著书过程的一种推求。而支撑着这种推求的，除了作家机敏的才思、发达的感觉，以及对创作和文本的烂熟于心之外，还有一种极重要的元素，这就是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同频共振——她用自己内心的“孤独”“苍凉”来打量曹雪芹写作时的孤立无援；她以自己作为贵族后裔的“身世之感”来体味《红楼梦》里的悲凉之气。于是，她的一番“梦魇”每生新见，别有会心。如认为《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一种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传统的双向运动等等。李存葆的长篇散文《东方之神》和《永难凋谢的罂粟花》，将艺术视线分别投向了“三国”人物关羽和一部《金瓶梅》，其笔锋所向虽然是对古人古事与古书的评说，但这有关古代的评说，却分明融进了作家的现实情怀与当下体验。譬如：透过关羽形象的梳理和剖析，读者可以听到作家面对社会急剧转型所发出的人格持守与道德重建的呼唤；而在《金瓶梅》的阐发与解读中，作家因商业时代物欲膨胀利令智昏所生出的深切忧患和由衷焦虑，更是迎面扑来。应当看到，正是这种现实情怀和当下体验，使得《三国演义》和《金瓶梅》有了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此外，在胡风、王西彦、王蒙、李国文等的谈“红”论著中，我们都很难发现论者自己的生命折光和心灵投影，这些主体性的元素，不仅为作家们的“红学”一家言打上了个性化的印记，而且从接受与传播的意义上，丰富和拓展了作品的内涵。

第四，现当代作家的古典小说研究和解读，有不少属于有感而发，直抒己见，是一种隔代同行之间的文心探访与艺术切磋，这决定了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较少因一味仰视所产生的“过度阐释”，而能够从实际出发，亦臧亦否，褒贬两见。

文学研究应当在宏观坐标之下，放出特定的尺度，对作家与作品进行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阐发与评价，即通常所谓“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理论上

讲，这是完全正确，毫无疑义的。只是一旦进入学术实践，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大凡学者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原本就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喜爱和认同，这种潜在的心理前提，常常将学者置于身不由己的境地，即一旦进入研究过程，便总是贯穿着一种发现的冲动和肯定的情愫，便总是希望通过发现和肯定对象以确立研究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当自己选定的研究对象已经属于一种范本式和经典性式的存在时，那么，这种发现的冲动和肯定的情愫，就有可能沿着某些学术或者非学术的惯性，做无限制的提升和放大，从而使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的一味仰视和倾力推崇中，陷入文学阐释的片面性和作品评价的绝对化。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研究史上并非少见，具体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也不是无迹可寻。就拿《红楼梦》来说，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备受赞誉的作品，固然取得了极高的文学成就，固然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峰巅之作，只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明它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更不意味着对它的研究和评价，只能说伟大，不能说不足。而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红学”研究领域基本是一片赞美之声。用俞平伯复出之后的话说：“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同样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小说名著的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面对这种情况，能以客观公允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古典小说的，恰恰是现当代作家。他们凭着来自创作实践的超常的艺术判断力，凭着和古代作家进行创作对话的寻常姿态，当然也凭着作家特有的更多关心作品本身而很少涉及科研功利的心理优势，常常能对具体的小说作品做出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不妨仍以《红楼梦》为例。如众所知，茅盾是《红楼梦》的推崇者和激赏者，但他却在推崇和激赏之余，参照陈独秀的意见，完成了节本《红楼梦》。而他删节的三个原则依次为：一，“金玉姻缘”“太虚仙境”等神话；二，大观园里的结社吟诗，极尽风雅；三，“宝玉挨打”“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门子舞弊”几段文字。在茅盾看来，这种删节“并不可惜”，因为所删文字殆皆是作品的“很不调和”处或“未能免俗”处。如果我们不盲从那些由来已久的说法，那么应当承认，茅盾透过节本取舍所指出的《红楼梦》里的弱项，还是颇有见地，发人深思的。同样，老舍也对《红楼梦》褒奖有加，不过在热情褒奖的前提下，他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作品在肖像和景物描写上存在的模式化的缺点，可谓一矢中的。端木蕻良一向钟爱《红楼梦》，为此，他晚年不惜带病力撰长篇小说《曹雪芹》，只是这并不妨碍他坦言：“《红楼梦》诗词并不怎么好”。联系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应当承认，作家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显然，如此这般的坦诚之论，不仅有益于读者看

到《红楼梦》的美中不足，而且在思维与方法的层面上，有效地匡正和裨补着整个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

第五，现当代作家的古典小说研究和解读，喜欢笔载性情，意迁妙想，纵横捭阖时讲究语言自身的美感，追求学术问题的审美表达，这决定了他们笔下的相关文字，总是感性中寓理性，机趣里藏智慧，具有文学作品一般的艺术魅力。

时至今日，文学与文章、创作与理论，早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类。这种文类的不同反映到语言表述层面，便形成了相应的差异：前者多讲究感情的抒发、形象的摇曳和辞采的营造，突出的是生动性与感染力；而后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鲜明，追求的是辩证性与说服力。古典小说研究与解读旨在对作品进行意涵的开发，从本质上讲，属于文章的理论范畴，因此，它的语言表述理所当然的呈现出对观念性、逻辑性和辩证性的倚重。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古典小说毕竟是一种文学性的存在。一种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诗性内质决定了有关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最终无法同情感、形象、辞采等等绝缘，相反，它呼喊着这一切对自身的融入和与自身的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兼有文章和文学、理论和创作双重特点的语言表述风度。关于这点，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仿佛早有察觉。他的《文心雕龙·总术》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兼理《诗》《书》。”强调的就是在语言表述层面，文学特性对所有文本的渗透和支持。而在这一方面，学者们当然可以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独厚的无疑是现当代作家。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练就的发达的形象思维和丰沛的艺术才情，使得其笔下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言说，很自然的带有了文学作品似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譬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语词灵巧，格调隽永，意趣挥洒之间，颇得小品文的神髓与风范。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让诗情参与论析，走笔落墨，流光溢彩，浑如艺术美文。进入新时期，一大批作家写下的古典小说笔记，更是各见文心，各呈异彩。如舒芜品评《红楼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陈迩冬《闲话三分》，亦庄亦谐，意趣两见；王蒙漫说《红楼梦》，见微知著，妙悟不断；李国文解读《三国演义》，嬉笑怒骂，举重若轻；李存葆重读《金瓶梅》，纵横捭阖，气势如虹；即使年轻些的谈歌写《水浒》人物今解，亦诙谐幽默，活泼俏皮，每见歪打正着之妙。显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别一种风景。

为了增加一点感性认识，还是让我们看看二月河解读《红楼梦》时，针对史湘云是“禄蠹”的说法所作的一番“正名”吧：“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撩开那层纱

幕，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看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她眷恋过去，但却与‘过去’坚决地分手了；她憧憬未来，但‘未来’对她却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这样的文字表达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散文；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艺术的。它借助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和美感，使通常难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说解读，变得生动、鲜活和亲切起来，从而为文章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机互补，提供了某种可能。

目
录
CONTENTS

现当代作家眼中的古典小说(代序)	古 耘 / 1
谈《金瓶梅》	鲁 迅 / 1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茅 盾 / 7
谈《金瓶梅词话》	郑振铎 / 16
灯市	阿 英 / 34
《金瓶梅词话》中的音乐史料	冯沅君 / 39
西门庆与“金瓶梅”	孟 超 / 49
谈《金瓶梅词话》	赵景深 / 61
谈《金瓶梅》	聂绀弩 / 67
《金瓶梅词话》跋	施蛰存 / 74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节录)	吴 晦 / 75
《金瓶梅》: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	李长之 / 91
《金瓶梅》杂说	孙 犁 / 96
《金瓶梅》头上的王冠	魏子云 / 103
《金瓶梅》及其他	黄 裳 / 116
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序	何满子 / 118
风俗画,话风俗	牧 惠 / 122
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面	刘师古 / 126
我读《金瓶梅》	宁宗一 / 146
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王 蒙 / 151
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	
——《潘金莲》遐想录	魏明伦 / 162

目
录
CONTENTS

《评点金瓶梅》序	刘心武 / 169
读《金瓶梅》	黄 霖 / 174
《金瓶梅》PK《红楼梦》	陈 冲 / 182
双莲叙旧	杨闻宇 / 187
永难凋谢的罂粟花	李存葆 / 190
名声不好的名著《金瓶梅》	刘兆林 / 226
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	王溢嘉 / 229
世间两部《金瓶梅》	田晓菲 / 238
莫将痈疽作桃花 ——我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	古 耘 / 248



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

悟读金瓶梅

谈《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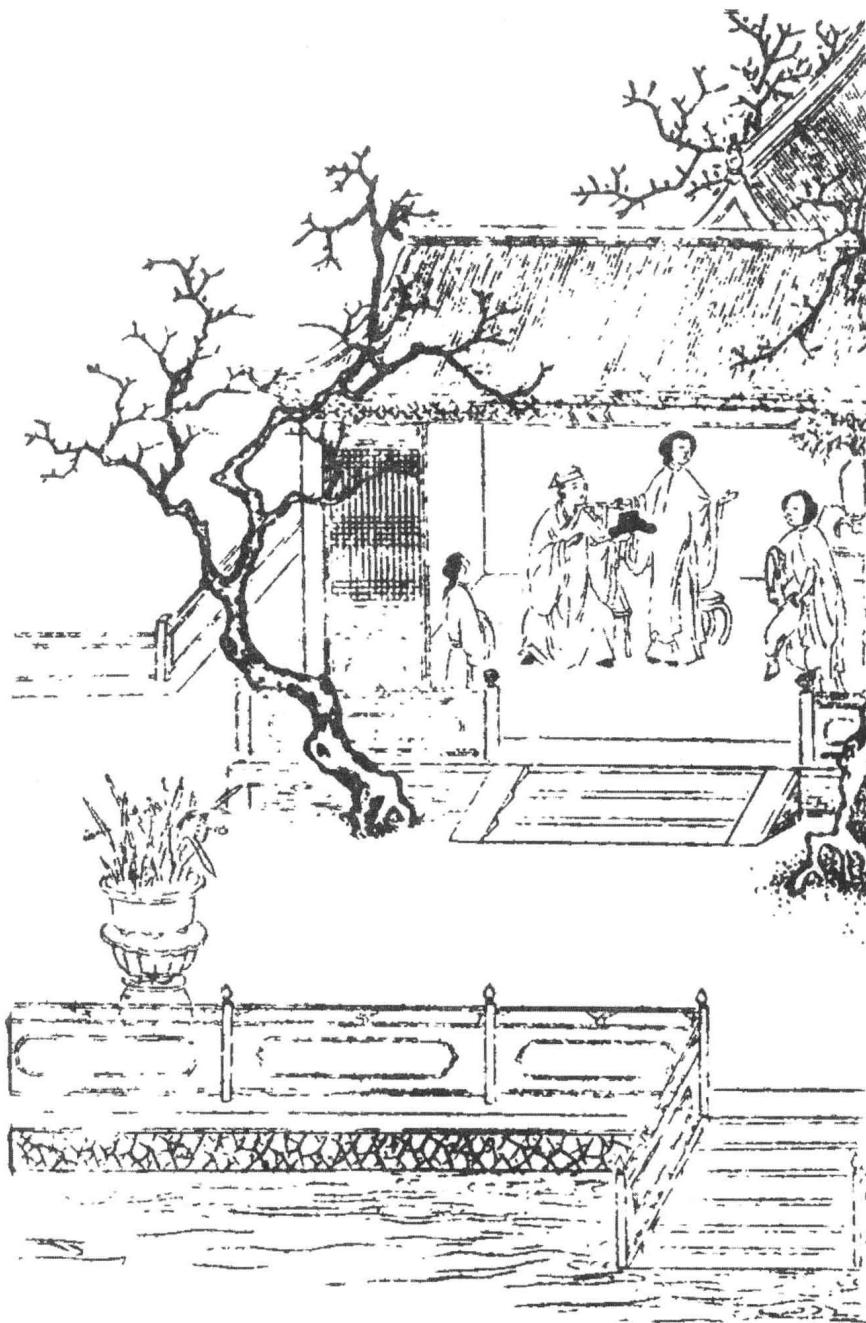
鲁迅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一六一〇），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赃枉法无不为。然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痨疾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



争宠爱金莲惹气